

## 《三国志演义珍稀古版汇刊》\*总序

陈 翔 华

在历史上,从罗贯中的编撰成书以前,到《三国志演义》文字的陆续刊刻,完整的三国故事传播形态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野史评话阶段:**罗贯中以前或其相近年代,除轶闻琐记与片断传说外,已经生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叙事性作品。例如元代中叶刊刻的《三国志平话》与后来翻刻本《三分事略》,以及还有研究者认为当出自元代而“重刊”于明成化年间的《花关索传》等。这些叙事作品的特点是:第一,具有首尾完整的情节结构,描写较多的人物形象(其中以蜀汉方面集团的人物为主体)。第二,在故事内容上,真假相羼杂。明庸愚子指出,罗贯中成书前,“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所谓野史评话,就是“讲史”(陶宗仪《辍耕录》记元代讲史伎艺人“胡仲彬乃杭州勾阑中演说野史者”)。伎艺人的讲史,“大抵真假相半”(《都城纪胜》、《梦粱录》)。“大抵”者,约其指也。《三国志平话》的基本情节安排大体上还合乎历史发展的顺序,有的事件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有不少虚拟和想象,如孔明杀曹使、诸葛亮死后令司马懿不得与蜀汉争锋等等。至于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则更为虚诞。第三,在民间流传,语言颇俚俗。庸愚子还说:这种野史评话,多“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

**传抄阶段:**今见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明弘治七年甲寅(1494)的庸愚子(金华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当时,庸愚子所看到并为之作序的就是传抄本。庸愚子指出:第一,这部小说的编撰者是“东原罗贯中”。第二,同野史评话相比较,罗贯中小说“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所谓“庶几乎史”,即接近于历史,但当然并不等同。也就是说《三国志演义》书中仍然保留有野史评话的传说成分。第三,叙事的语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也介于史书与评话之间。第四,在文人中广泛传抄,“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

\* 本书即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从书成到首次版刻间，这部长篇小说便已由稿本产生出很多传抄本，庸愚子说，当时读者“争相誉录”。其“争相”的结果，传抄本不会止有一部而当有好几部。这一百多年来，辗转反复的传抄而出自众人之手，其间难免诸多舛互讹夺以及增删修改。例如所见最早梓行的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修髯子《引》刊本，其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有云“后尹直赞孔明曰”并引录《赞》辞一首。按此《赞》乃见明尹直（1427—1507后）《名相赞》卷之二“蜀汉”，题《丞相武侯诸葛公孔明》。尹直字正言，江西泰和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孝宗弘治帝即位，“令（其）致仕”。弘治九年他还上表，“冀召对。帝却之。正德（1506—1521）中卒”（见《明史》本传）。《名相赞》卷前有著者引言，署“弘治甲子春二月初吉”、“七十八翁澄江居士尹直正言引并书”。“弘治甲子”即弘治十七年（1504），此时他已“致仕”还乡多年。可见《名相赞》成书比庸愚子为传抄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撰序晚了整整十年，其赞孔明辞当非罗贯中原书所有，显然是庸愚子撰序以后的传抄者擅自添加羼入的。

**版刻阶段：**关于这部小说版刻的最初记载，见于修髯子（关西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此《引》以答客问的形式，说是书“以俗近语隐括成编”，使人了然于“是是非非”，“裨益风教，广且大焉”。客者随即提出：这部长篇小说“简帙浩瀚，缮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sup>①</sup>于是，以前“简帙浩瀚”的手抄“缮本”，便有了梓刻。由此可知，《三国志演义》首刻年代乃在修髯子撰《引》之时。今见三种明刊本存录修髯子《引》，但其所署撰年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嘉靖元年壬午（1522）说，见上海图书馆藏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据以影印的主要底本）。卷前《引》末署“嘉靖壬午孟夏吉望关中修髯子书于居易草亭”。一为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说，见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藏明夏振宇刊本。卷前《引》末署“嘉靖壬子孟夏吉望关中修髯子书于居易草亭”。此“嘉靖壬子”说，又见明万历间周曰校刊本卷前所署。按“嘉靖壬午”与“嘉靖壬子”，年份的天干“壬”字相同，而其地支“午”与“子”两字不同，时间却相差三十年。故此，其间必有一误。

考修髯子《引》刊本的首刻时间，应在嘉靖元年。据记载，明武定侯郭勋在嘉靖十年至十六年间编印《大明英烈传》时，刊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等（见本文下节）。而今见修髯子《引》明白无误地指出其撰《引》前只有抄本，正由于“缮本甚艰”，因此才“寿诸梓”以“公之四方”。可见修髯子《引》刊本的首刻时间只会在“武定板”之前，而不可能如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所署的嘉

<sup>①</sup>见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藏明夏振宇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修髯子《引》。按“缮本甚艰”，上海图书馆藏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善本甚艰”。按此处非指珍贵难得之本（“善本”），乃谓抄写工作非常艰难。这部“简帙浩瀚”的小说，此前只有“誉录”（庸愚子《序》），所以修髯子因其抄缮工作繁重而说“缮本甚艰”。故此处文字，以夏振宇刊本为是。

靖三十一年。

再看书目著录。最早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的，是明高儒《百川书志》。其卷六史部野史类记此书“晋平阳侯[相]陈寿传，明罗本贯中编次”云云，与上海图书馆藏本卷端题署大体相同。高儒著录的内容提要，也是参考庸愚子《序》与修髯子《引》而撰成的。修髯子说：“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通常读者展卷“鲜不便困睡”；而这部小说“以俗近语，隐括成编”，使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高儒则概括而换言之，说：罗氏小说“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而“非俗非虚”，使读者“易观易入”云云。高儒显然是读过修髯子《引》的，而其所著录亦当为此书首刻本。《百川书志》是百川子高儒的家藏书目，修成时间见自序所题“大明庚子岁嘉靖夏五月端阳日书于志道堂之楹”<sup>①</sup>。按“庚子岁”即嘉靖十九年（1540）。由此著录而知，《三国志通俗演义》既然在嘉靖十九年以前已经入藏于涿州高儒的书斋志道堂，则其刊印时间必先于此前。上文已提及，能够确认这部小说首刻时间的修髯子《引》的撰年有两说。假设修髯子《引》撰于嘉靖三十一年的话，那末《三国志通俗演义》首刻则比嘉靖十九年成书的《百川书志》要晚十二年；倘若如此，高儒是无从著录于他的家藏书目的。只有修髯子《引》撰于嘉靖元年而首刻之，即比《百川书志》要早十九年出书，高儒才能入藏并加以著录。

以上可见，经过传抄阶段的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始刻于明嘉靖元年壬午无疑，而尽管现存的修髯子《引》刊本未必都是此年印行的。

## 二

嘉靖元年以后，明代官私家纷纷竞相争刻罗贯中《三国志演义》。

嘉靖、隆庆年间刊本，今所知见的存书或著录，有：

第一，嘉靖元年壬午（1522）修髯子《引》刊本（下或略称为嘉元序刊本）二十四卷，上海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以及原北平图书馆（旧存）等处藏。诸藏本不一定都是首刻初印，即有的是，也有的其母本或祖本乃出嘉元序刊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配补修版而成所称嘉元序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印本，其实是一个不可视同于原藏的凑合本<sup>②</sup>。

①见清叶德辉《观古堂汇刻书》所收《百川书志》，木刻本。按，高儒自序共两篇，此引文见于前序。后三日（当为五月初八）又作再序，谓其搜书“锐意访求，或传之士大夫，或易诸市肆，数年之间，连床插架”。于是，“次第部帙”，编撰书目乃“六年考索，三易成编，损益古志，大分四部”。由此不妨推度，至明嘉靖十三年，高儒的藏书大体上已成规模，并对所藏本进行了研究和著录。其志道堂不知何时入藏《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不排除嘉靖十三年已经搜罗到手，但最迟不会晚于嘉靖十九年。

②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此书，以上海图书馆藏本为主要底本，“上图”藏本中残破和字迹模糊的部分，则以甘肃省图书馆藏本相应的书叶配补。影印时，还对原藏本有些书叶进行修版，并删除后人的批改文字。故此影印本不可视之同于原藏本。本文以下略称此为人文影本。

又，上海涵芬楼 1929 年影印本，书名作“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按涵芬楼曾借日本文求堂田中所藏本，后又购得前半配补之，乃影印成全书。因底本缺嘉靖元年序而仅存弘治序，影印本遂误题作“弘治本”。经比勘，其刻板形式、行款、字体等俱同上海藏本，内容上除卷十六《玉泉山关公显圣》对关羽被俘受戮的文字加以删减重写外，其馀正文与夹注几乎相同。故所谓“据明弘治本景印”的原底本，其实是嘉元序刊本的后印本。

第二，嘉靖二十七年戊申（1548）元峰子《序》刊本十卷（存八卷：卷一、二、四至九），叶逢春刊，西班牙马德里爱斯高里亚尔修道院藏（下略称为叶逢春刊本，或西班牙藏本）。此本卷前有《三国志传加像序》，末署“时嘉靖二十七年岁次戊申春正月下浣之吉，钟陵元峰子书”。上图下文，是今见最早的《三国志演义》“加像”本。

第三，武定侯郭勋府刊本。明晁瑮《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类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下有小字注云：“武定板。”按“武定板”，即嘉靖间武定侯郭勋府刊本。勋为明开国功臣郭英后，正德三年（1508）袭封。“嘉靖十年间，刑部郎中李瑜议进诚意伯刘基侑祀高庙，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勋欲进其立功之祖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明刊本《皇明通纪述遗》卷十）。至嘉靖十六年，郭勋“乃疏乞祀英庙庑”，“上是勋言，进英祀”（同前）。嘉靖十八年闰七月，“进封郭勋翊国公”（明刊本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三），不再称“武定侯”了。可见“武定板”当刊刻于嘉靖十年（1531）以后数年间，最迟不晚于嘉靖十六年（1537）十二月<sup>①</sup>，要比叶逢春刊本早些时候。

第四，都察院刊本。明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著录都察院刻书有“《三国志演义》”等。按，周弘祖，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曾官福建提学副使等。周氏主要活动于嘉、隆间，故疑都察院刊本当成于嘉靖或隆庆年间。<sup>②</sup>

第五，经厂刊本。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纪略》记载明内府经厂库内所藏司礼监刊本的板片中，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廿四本，一千一百五十叶”。按，司礼监所属经厂刻书用工，嘉靖十年核查定额为刊字匠三百十五名、刷印匠一百三十四名、表背（装订）匠二百九十三名及纸匠、墨匠等共一千二百七十五名，当时刻印图书很多。经厂刊本《三国志演义》本当成于嘉靖或稍后时间。按王重民以为涵芬楼景印的底本“即此本”<sup>③</sup>，但不知是否。

①还可参见明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三十，以及明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又名《嘉靖以来注略》）卷二、三等。按，郭勋因刘基配享太庙而欲其祖郭英亦入庙从祀，遂编刊小说《国朝英烈记》。果然此书“传说宫禁，动人听闻”，乃一如所愿，并且一年多后他自己也由武定侯进封为翊国公。其《英烈记》是仿效《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写法而为之，故“武定板”《三国志演义》等刊刻当在其编撰《英烈记》之稍前时间。

②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二，疑此书为“嘉靖刊本”。

③《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十四小说类）

此外，明《文华殿书目》著录有《三国志通俗演义》（见清阮葵生《茶餘客话》卷十六），不知即司礼监经厂刊本否？

到万历二十年（1592），明代著名出版家与通俗小说杂著编纂家余象斗，谈及坊刻本。他在其所刊《批评三国志传》的封面识语中说：“《三国》一书，坊间刊刻较多”，同时又在《三国辩》中指出：“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这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很值得我们注意。

1.余象斗当时所说坊刻本“何止数十家”，刊板极其繁富，而今我们对此几乎无所知悉或知之甚少。现存此前的坊刻本，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有叶逢春刊嘉靖二十七年序本和周曰校万历十九年刊本两种，而这两种早于万历二十年又带有插图的坊本，却还都没有纳入余象斗的计数之内，故因余氏说全像本，“止刘、郑、熊、黄四姓”。《三国辩》所说“何止数十家”云云当非虚言，再加上叶、周二氏所刻，更见民间刊刻此书之风很盛。

2.余象斗所知见的《三国志演义》坊刻本并非俱出于万历年间，其中有些肯定在前朝已经刊板了。《三国辩》谈及出刊“全像”本的郑氏宗文堂、熊氏种德堂、黄氏仁和堂、刘氏爱日堂，都是建阳书林的刻书世家<sup>①</sup>。余象斗说，郑氏宗文堂刊本“人物丑陋，字亦差讹，久不行矣”；又说刘氏爱日堂刊本“其板虽无差讹，士子观之乐然，今板已蒙，不便其览矣”。诸“全像”本如果刊刻于万历元年，到余象斗所见时不过二十年，当不至于“今板已蒙，不便其览”，或称之为“久不行矣”。由此可以推知，其刻板当在以前，上溯乃至隆庆或直达嘉靖间。

3.已经出现了删节整理本。余象斗说，黄氏仁和堂“全像”本，“纸板虽新，内则人名、诗词去其一分”。也就是，这个刊本所描写的人物和引述的诗词，比原本要少些。究竟是仁和堂的删节还是此前底本的删削，今已不得其详了。

总之，嘉靖以来刊板繁多，而其中尽管不少佚失或不见于著录。但当时已经出现了修改本和“全像”本，则是确实的。

### 三

所见《三国志演义》的明代以及清代初年刻本，都经过了加工修改，并不完全是罗贯中原著的初始面目，尽管其中程度不等地保存有原来的文字。而且版刻早的刊本也未必都比后刻者更接近于罗氏原书，如果这些后刻者真正来

<sup>①</sup>郑氏宗文堂为建阳元代老铺，今存嘉靖三年《新刊蔡中郎伯喈文集》有木记“嘉靖甲申孟冬月宗文堂郑氏新刊”。熊氏种德堂为著名刻书家熊宗立晚年及其后人书坊，今存成化五年《类证陈氏小儿痘诊方论》有木记“成化己丑熊宗立种德堂刊”。黄氏仁和堂，今存天顺二年《大学章句》有木记“大明天顺戊寅黄氏仁和堂刊”。建阳刘氏乃历史悠久、名肆众多的刻书大家族。因宣德间刊本《书传大全通释》木记作“守中书堂”刊，而卷三题下作“刘氏日新书堂重刊”，王重民说：“刘氏日新堂开设在元，此又题作守中书堂者，疑入明以后，子孙分其业，又各立堂名故。”（《中国善本书提要》经部二书类）按，余象斗所说刘氏爱日堂，疑亦日新堂后人分其业所立之堂名也。

自“古本”或“旧本”。

在明代,《三国志演义》的刻本存在着“古本”、“旧本”文字以及“新旧本”共同的文字。

先说“古本”文字。例如《三国志演义》写刘备冒风雪往访诸葛亮未遇时,所听到黄承彦“口诵”(一作“口颂”)《梁父吟》一诗的词句;诸明刊本就有“古本”与非古本(即新本)的文字异同。今将万历十九年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下略称周曰校刊本)卷四记载《梁父吟》诗及其后考证“古本”的文字,抄录于下:

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空中乱雪飘,改尽山川旧。仰面观太虚,想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白发银丝翁,岂惧皇天佑。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考证]古本作盛感皇天佑。

其实,差异还不止于此句。现将所见刊行年代可识别的明刻本,表列其中《梁父吟》相关异同处,以考“古本”与非古本的文字。

所见明刻本中《梁父吟》相关异同比照表

版本	刊行时间	句数	第三句	第九句	第十句	备注
嘉元序刊本	嘉靖元年	十二句	空中乱雪飘	白发银丝翁	岂惧皇天漏	黄承彦“口诵”
叶逢春刊本	嘉 27 年	十句	长空雪乱飘	白发老衰翁	盛感皇天佑	黄承彦“口颂”
周曰校刊本	万 19 年	十二句	空中乱雪飘	白发银丝翁	岂惧皇天佑	黄承彦“口诵”
余象斗刊本	万 20 年	十句	长空雪乱飘	白发老衰翁	盛感皇天佑	黄承彦“口颂”
熊清波刊本	万 24 年	十句	长空雪乱飘	白发老衰翁	盛感皇天佑	黄承彦“口念”
黄正甫刊本	天启三年	十句	长空雪乱飘	白发老衰翁	盛感皇天佑	黄承彦“口歌”

以上可见:1.就《梁父吟》第十句而言,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熊清波刊本、黄正甫刊本以及未入上表的汤宾尹校本、刘龙田刊本等俱作“盛感皇天佑”,如周曰校刊本注释(“考证”的提示,这些正是“古本”文字。而通常被认为今存最早的嘉靖元年序刊本等此句则作“岂惧皇天漏”,却反是经过改易的非古本(即新本)文字。周曰校刊本此句末三字虽与古本相同,但其首两字“岂惧”同嘉元序刊本,亦非俱是古本。

2.古本《梁父吟》共十句,而非古本却增衍至十二句。全书的关键在于第十句。余象斗刊本等第十句“盛感皇天佑”,意乃由纷飞的瑞雪联想到预兆着的丰年即将来临,老翁黄承彦于是深深感怀上天的神“佑”。全诗至此,意已尽止,不必再画蛇添足,因而只有十句。但是,嘉元序刊本第十句改作“岂惧皇天漏”。按,“皇天漏”乃喻纷飞的大雪。全句只说不畏隆冬雪寒,诗意不能已,故据前后文再补添“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作结,便有了十二句。至于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等情形虽不尽相同,但也都袭用了嘉元序刊本或其母本的末两句,成十二句。

3.此诗第十句诚然是“古本”与非古本文字最重要区别之所在,但是其他诗句也并非没有异同。例如第九句,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等作“白发老衰翁”,文字质朴直白,亦当为“古本”文字;而嘉元序刊本、周曰校刊本则润色为“白发银丝翁”,便雅驯得多了。又如第三句,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作“长空雪乱飘”,而嘉元序刊本、周曰校刊本作“空中乱雪飘”。诸如此类,由于意思差别不太大,所以明刻本注释无需一一揭示,以免繁复。

其次,说“旧本”。今见三种明刻本的注释,指出当时还存在“旧本”《三国志演义》。嘉元序刊本卷十二《张永年反难杨修》写张松诈称《孟德新书》乃战国时无名氏作,蜀中小童亦能暗诵。杨修辩驳之,说:“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汝于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曹操听杨修说张松的记诵,以为“古人与吾暗合”,于是“遂令扯碎其书(《孟德新书》),烧之”。其下还特加双行小字夹注,指出:“旧本(《三国志演义》)书作板,差矣”云云<sup>①</sup>。嘉元序刊本这里提出了“旧本”与非旧本的异同,这些文字的基本意思在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中都可以看得到。现将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所写的杨修辩驳,曹操听到杨修说张松记诵后的反应,及其下的小字夹注,以与嘉元序刊本、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此处文字俱同)相比照:

版本	杨修辩驳	曹操反应	小字夹注
叶逢春刊本	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刊板,未曾传播于世。(下略)”	曹曰:“莫非古人与吾暗合否!”遂命破板烧之。	至今此书(《孟德新书》)不传于世。
余象斗刊本	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刊板,未曾传播于世。(下略)”	操曰:“莫非古人与吾暗合否!”遂命破板烧之。	至今此书不传于世。
嘉元序刊本	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下略)”	操曰:“莫非古人与吾暗合欤!”遂令扯碎其书,烧之。	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今《孙武子》止有魏武帝注。
夏振宇刊本	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下略)”	操曰:“莫非古人与吾暗合否!”遂令扯碎其书,烧之。	[考证]《孟德新书》不可考,今《孙子兵法》有魏武帝注,疑即此书。至柴世宗时方有刊板。旧本《三国志》。

由此而见,在嘉靖、万历间,《三国志演义》已存在着“旧本”与非旧本。这里区别的关键在于《孟德新书》是不是板刻的印刷品。正如嘉元序刊本的小字注所指出:“旧本‘书’作‘板’”。(夏振宇刊本与周曰校刊本这里的“考证”

<sup>①</sup>周兆新《旧本〈三国演义〉考》已先我关注此条注释文字,并加以论述。见其《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文字漏脱此句，但其意思与嘉元序刊本完全相同。）<sup>①</sup>按今姑勿论“刊板”的起源，但是从历史上看，曹操那个时代还没有产生雕版印刷术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非旧本将有关文字修改作“虽已成佚”、“遂令扯碎其书烧之”，而“旧本”或以“旧本”为母本、祖本的后刻本仍然保存原来的“虽已刊板”、“遂命破板烧之”。

在所见诸明刻本中，除上表列出外，保存这些“旧本”文字的还有汤宾尹校本、熊清波刊本、刘龙田刊本、朱鼎臣辑本、黄正甫刊本等；而已加修改过的非旧本，则还有周曰校刊本、李卓吾评本、钟伯敬评本等。

上表所见的非旧本注文，都是针对“旧本”而言的。非旧本这里的注文，包含有两重意思。其一是指出“旧本”正文“刊板”、“破板”的错误，说明与非旧本的异同（已见上文叙说）。其二是关于《孟德新书》的流传问题。“旧本”小字注云：“至今此书不传于世”。（汤宾尹校本因正文“破板烧之”，而小字注云：“致令此书不传于世”，稍异。）而非旧本小字注则认为此书未必“不传”。嘉元序刊本说：“今《孙武子》止有魏武帝注。”夏振宇刊本与周曰校刊本说：“今《孙子兵法》有魏武帝注，疑即此书。”按，非旧本小字注当自有据。今见《隋书·经籍志》三著录：“《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魏武帝注”，“《孙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又，《宋史》艺文志六兵书类著录：“魏武帝注《孙子》三卷。”这些著录当为非旧本小字注所参考。

从这些小字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某些版别文字生成的先后。在这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等不仅正文保留“旧本”文字，而且其小字注文也比嘉元序刊本早。嘉元序刊本是通常被称为最早的刻本，今见所藏如果不是经过递修后印的话，这里的正文与小字注却为什么反出于晚刻数十年的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之后呢？这是因为在传抄与刻印过程中，嘉元序刊本经过了很大的修改和过度的整理，而余象斗刊本等虽也有所整理，但是较多的保留“旧本”、“古本”的原有文字。

再次，说说“新旧本”。夏振宇刊本卷十一《姜维洮西败魏兵》写蜀大将姜维伐魏而背洮水布阵，魏雍州刺史王经引“十员牙将”出，乃回顾诸将说：“姜维骁勇，汝四将可战之也。彼若退动，便可追击。”于是，“四将左右而出，来战姜维”。在王经所下达的口头命令中，当说到“汝四将可战之”时，下有注释：

[考证]传内四将，新旧本皆不载姓名。及考《三国志》史传，乃有姜维在洮水杀了魏将张明、花永、刘达、朱芳等一十馀人，盖即此四人也。

夏振宇刊本的这条注文，在周曰校刊本中也可以找得到。这两种明刻本所说的“新旧本”，即为《三国志演义》新本与旧本。无论是新本还是旧本，都没有写出王经部属“四将”是谁。不过只在这一点上相同，而其实正文的具体表述却

<sup>①</sup> 参见拙作《北平旧藏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载《三国志演义纵论》，文津出版社，2006年。

又有所异同。今将多处可见旧本文字的余象斗刊本，与存有若干新本文字的夏振宇刊本相比较：

余象斗刊本	夏振宇刊本
于是蜀兵皆在洮水列成阵势。姜维出马与魏将打话，门旗里王经引数十骑牙将而出。经问曰：“今天下已成鼎足之势，汝等长时出寇，此心不成，庶无耻也。”维曰：“司马师无故废主，理宜问罪，何况是仇敌乎！敢死者出马。”经回顾诸将曰：“蜀人背洮水而来斗敌，此军必败。败则背水没于水矣。姜维势勇，汝等四将，何[可]併力战之。维若一走，便可追击。”言未毕，左右四员猛将四般军器，来战姜维。	此时蜀阵背洮水布列。姜维出马，搦魏将答话。王经引十员牙将出而问曰：“魏与吴蜀已成鼎足之势，汝累入寇，此真不识时务也。”维曰：“司马师无故废主，邻邦理宜问罪，何况是仇敌之国也。敢死战者出马。”经回顾诸将曰：“蜀兵背水为阵，败则皆没于水矣。姜维骁勇，汝四将可战之也。（下有“考证”，已见上引，此略）彼若退动，便可追击。”四将左右而出，来战姜维。

上表所见，余象斗刊本写“王经引数十骑牙将而出”，汤宾尹校本与此相同；而夏振宇刊本作“引十员牙将”，嘉元序刊本、周曰校刊本同。按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都有注文“考证”，说姜维在洮水杀魏将张明等“一十馀人”。既然姜维杀魏将“一十馀人”，那末王经出阵所引不当只有十将，否则还不够为姜维所杀。可见夏振宇刊本等此处难以信从。而魏将在洮水被杀十馀人，部分将领又扈从主将王经败退到狄道城，两数相加，故余象斗刊本等说当初出阵时，“王经引数十骑牙将而出”。这样，就自然而合理得多了。

总之，由上可见：

第一，《三国志演义》某些明刻本的注释，提出了当时已经存在的“旧本”（见嘉元序刊本、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古本”（见周曰校刊本），“新旧本”（见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的问题。“古本”当即为“旧本”。故而明刻本可以极其粗略地分为“旧本”系统与“新本”系统，尽管其间有时还存在着交错影响，也并不那样十分单纯。

第二，“旧本”文字生成时间早。嘉元序刊本通常被认为是最早的刻本，其注释就已提到“旧本”，可见“旧本”先于此书而生成于传抄阶段，尽管经过修改而正式雕板印行的时间却要到晚很多年以后。而非旧本也另有据以整理的母本，嘉元序刊本的母本在传抄时就当有很大的修改。

第三，文本上的歧异。从今见极其有限而不完整的新本注释提示中，可以看到新本（或其母本）所进行的工作：1.订正旧本谬误，2.修改旧本文字等等。其实，新本注释未曾提示的，其与旧本间还存在大量歧异。诸如段目、分段，以及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与细节文字等描写，也都存在着种种差别。当然，由于各自所进行的不同整理，诸新本间与诸旧本间也有异同。

至于明刻本中的关索以及其他人物故事情节描写的诸多异同，情况比较复杂，并非三言两语可以交代清楚的，这里就不加叙说了。

现存《三国志演义》诸明刻本，都非罗贯中当初编撰的原来面目，而是在以后的传抄与版刻过程中，由众多整理者进行过程度不一的修改，有的甚至作很大的变动。但是，这些刻本又都保留有原书的若干文字。因此，从纷杂繁复的版本中，通过仔细深审的比勘，逐句逐段地鉴别其真伪，去探索与勾勒罗贯中原作的某些文字和细节，然后集腋成裘，可使我们得见接近于罗贯中所编撰的原书面貌。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把握诸明刻本与清初刻本，是良好研究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由此而发，则可以避免“痴人说梦”与“瞎子摸象”现象的产生，也才会把《三国志演义》及罗贯中的研究工作不断地推向纵深的发展。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 《陈乃乾文集》整理出版

虞坤林先生标点整理的《陈乃乾文集》近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是著名学者、版本目录学家、文史学家陈乃乾先生的论著结晶，共收录陈乃乾主要学术论著 300 多篇(种)，分为海上书林、读书识小录、共读楼札丛、序跋、善本书经眼录、人物年谱、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上海地方志综录等整理校订类论著，有些论著尚属首次刊布，具有重要的参考研究价值。